



简 报

2012 年第 3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2 年 6 月 5 日

编者按

1. 马克思与斯密关于投机行为的不同看法..... 高嵩
2. 什么样的劳资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技术创新? 杨巨
3. 经济学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探索研究..... 黄湛冰 肖尔特
4.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评价及主要障碍..... 于敏 王小林
5. 工业化中政府作用的经济分析..... 肖翔 董香书
6.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及其空间效应分解..... 陈得文 陶良虎
7. 中国品牌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刘华军 赵浩 杨骞
8. 国有企业效率与退出选择..... 朱克朋 刘小玄
9. 国有企业需要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吗? 魏峰 荣兆梓
10. 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 张志强
11. 一个争议问题的再检验: 居民资产是否促进了消费? 张五六 赵昕东
12. 财政援助性支出与农村贫困家庭的民生..... 林昕 刘穷志 李宇 温逸露
13. 农民工、社会网络和劳动合同形式: 一个案例研究..... 王啸华
14. 收入风险冲击影响了农户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吗? 马强文 任保平 韩绵绵
15. 整体上市热潮之我见..... 王永海 章涛
16. 法律、审计与企业价值..... 余玉苗 王宇生
17.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再思考——论东亚转移效应..... 李强 王孝松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 马克思与斯密关于投机行为的不同看法

高嵩（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3 期

人们也许会认为，包括托宾（Tobin，1965）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家较早地分析了投机，其实不然。马克思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社论中就关注过投机，在后来出版的《资本论》中又多次提及。他把投机理解为买入卖出资产赚取差价的行为，而购买资产投入生产经营从中获得收益的行为，不妨称其为投资。

如果接受马克思的观点，把投机理解为在资产价格涨跌中“谋自己的利益”，就能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堪称投机充斥的时代。与参与生产经营相比，人们更愿意投身资产买卖赚取差价：当预期某类资产价格有足够幅度上涨时，抢先以较低价格买入；当预期某类资产价格不会有足够幅度上涨时，抢先以较高价格卖出。

斯密和马克思都曾论及谷物市场，从中可以体会他们对投机的不同态度：

斯密面对投机时闪烁其辞。在斯密笔下，谷物市场既不存在垄断，也不存在投机。总需求取决于分散进行的消费选择，总供给取决于分散进行的生产经营，均衡位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相等处，谷物商按“最适合于季节丰歉程度的价格”出售。不过，现实的谷物市场毕竟存在投机，考虑到投机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影响，谷物价格便不再“适合于季节丰歉程度”。当预期价格上涨时，谷物商买进并囤积谷物还会造成当期总需求增加和价格上扬，对人民大众的利益造成损害。斯密感受到人民对谷物贸易的“反感”，却没有意识到“人民的反感”针对的恰恰是谷物商的投机。他总是一味强调从事国内贸易的“谷物商的利益决不可能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相违背”，而事实上，人民大众的利益与谷物商的利益有多么不同。斯密的观点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他的追随者虽然接受人们从价格波动中获益的可能，却认为“投机只能对经济造成”扰动。布兰查德和沃森（Blanchard and Watson，1982）还曾无奈地指出，不引入额外的假设条件就不能确定“投机性泡沫”的值。

马克思对投机行为洞若观火。马克思看到传承自斯密的学说与现实不符，他讽刺道：“现在摆在自由贸易派面前的，不但有丰收情况下的粮价高涨，而且有工商业的危机”。某些时候，即便产量增加，选择投机的资本家只要判断价格会有足够幅度上涨，就会购买并囤积谷物，造成当期总需求增加和“粮价高涨”。马克思看到，谷物市场也有“投机狂”，他们买入卖出谷物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而影响价格水平，给一些人的利益带来损害。比如 1769-1770 年的英国，就有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既然投机还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在马克思笔下，利益遭受损害的人一定会努力制约选择投机的资本家。不过，正像他引述吉尔巴特的话意图表明的：“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很难有效制约选择投机的资本家。马克思注意到，在法国，

1856年3月9日“通报”上的评论直接反对投机借以实现的途径——“匿名公司”，却没能迫使选择投机的资本家有所收敛，他们找到“[两合公司]这种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使得“投机活动只不过改变了自己的途径”，就可以“几乎是完全不受监督”。

究其原因，斯密和马克思从各自不同的个人观念出发分析谷物市场，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斯密忽视人们彼此间的依赖和制约，用自利性和理性去刻画个人，这使他很容易就否定彼此依赖和制约着的一方——选择投机的资本家，也使他在面对人们彼此间的利益矛盾时无所适从，武断地认为人民大众对谷物贸易反感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谷物商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除了自利性和理性，马克思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也看作个人的行为特征，依照他的逻辑，为斯密所诟病的“下层人民将自己的困难归咎于谷物商人的贪婪”确实事出有因；政府“认可和鼓励”人民对谷物贸易的反感，也是人民为制约选择投机的谷物商而努力的结果。

2. 什么样的劳资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技术创新？

杨巨（中国人民大学）

《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经济评论》
2012年第3期

在中国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1995-2010年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下文简称“资本收入占比”)从34%上升到40%，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文简称“劳动收入占比”)从53%下降到45%，变化的速度和幅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担心这种变化趋势会引起内需不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际上，这种变化趋势还会影响技术创新。

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曾提到，大规模投资于技术创新需要两个条件：利润率水平的高涨和市场的重大扩张，技术创新停滞与平均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困难相联系，同时也与无法销售日益增多的生产商品相联系。但是，假设群众消费品销售量的迅速扩张与利润率的显著增长同时并存是不现实的，一方面，销售量的迅速扩张要求居民收入的迅速扩张，而居民收入的迅速扩张则一般要求劳动收入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利润率的显著增长意味着资本收入的迅速增长，但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总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劳资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会产生技术创新的有利因素也会产生技术创新的不利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教授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曼德尔两难”。

在劳资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过程中，资本收入占比的上升有利于技术创新。众所周知，技术创新一般需要大规模前期投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可简单分为两类：一是外部来源，包括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和以发行股票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二是内部来源，主要指企业可用现金流，这种现金流与利润率关系紧密，一般来说，利润率越高意味着企业可用现金流越多。在中国，由于银行贷款更多地与国有企业相联系，并且股票融资市场不发达，企业

自有利润对于整体企业创新来说特别重要,资本收入占比的上升减小了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而增加了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在劳资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不利于技术创新。目前,劳动收入仍然是居民消费的首要收入来源,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会引起居民消费率的下降,而居民消费率的下降降低了企业创新产品的市场前期预期,企业创新动力下降。在曼德尔看来,技术创新水平与生产商品销售量正相关;在哈佛大学波特教授看来,居民消费水平是一个国家从投资导向阶段成功进入创新导向阶段的必要条件,因为国民消费水平越高,企业改进产品的压力越大,国家产业也会朝着更高级水平发展。

在实际过程中,中国劳资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到底如何影响技术创新呢?经过笔者规范测算,资本收入占比(劳动收入占比)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资本收入占比(劳动收入占比)的小幅上升(下降)对技术创新有利,大幅上升(下降)对技术创新有害。在资本收入占比比较低的情况下,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技术创新加快;在资本收入占比已经较高的情况下,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就会小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技术创新减慢。经过初步测算,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最优”资本收入占比和“最优”劳动收入占比分别为36%和51%。所以,在中国,要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有必要调节劳资收入分配格局,有必要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一个有着更高劳动收入占比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更有利于技术创新。

3.经济学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探索研究

黄湛冰(陕西师范大学)、肖尔特(卡耐基梅隆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经济学实验在政策研究方面具有一些其他研究方法所没有的独特优点,若斯(Roth,1988)用“在王子耳边低语”比喻经济学实验研究结果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参考价值。然而,来自实验研究的“低语”通常具有不同的外部适用性,因此如果能够明确现有实验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排序,那么就可为实际问题提供更精确的政策制定参考,并从学术上为改进相应实验设计提供指引。

为什么排序可为实际问题提供更精确的政策制定参考?从当今公共管理实践看,处在网络化环境中的公共管理者面临越来越多复杂的、难以解决的奇特问题(Moore, 2011),与这类公共管理问题相关的实践活动迫切需要得到理论的支持和指导;与此同时,大量的经济学实验研究成果揭示出不同因素间的内在关系,但数量日益庞大的实验结果及其不同的适用范围又使政策制定者难以适应。在此情形下,对具体问题的经济学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排序能够比较这些成果的外部适用性差异,帮助政策制定者对实际中能否采取与实验处理相似的做法做出更精确的判断和取舍,增加现有实验研究结果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参考价值。

排序也有学术价值,实验是否能反映现实的并行问题多年前就受到社会科学理论界的关注,通过排序可探索具体问题上的实验研究结果和实际应用之间的并行关系,获得具体问题下的现有实验研究跟实践间的缺口信息,为改进或开发实验设计提供支持。

如何对一个具体问题下的多个实验研究结果的外部效率进行排序?首先需要确定一套判断标准,我们提出了一个两标准方法,两标准来自于两个对经济学实验外部效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结果,一个认为不同的实验设计类型具有不同的外部效度(Harrison and List, 2004),另一个认为实验结果外推需要考虑非财富因素的作用(Levitt and List, 2007),目前虽有这两个理论结果,但还没有一个能够对同一问题下已有实验结果外部效度进行排序的具体方法,这一缺失削弱了经济学实验在政策制定参考方面的作用发挥。基于这两个理论结果的思想,我们提出一个外部效度量化排序的具体方法:先确定实验类型,再确定非财富因素,进而通过对嵌套社会困境环境下的公共品实验结果外部效度进行排序说明其具体运用,填补这方面空缺。

研究得出结论:(1)实验设计类型和具体实验处理中包含的行为因素方向及强弱可作为两个判断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大小排序的标准,分别起到实验类型外部效度排序和特定实验类型下外部效度进一步排序的作用,同时运用两个标准能够得到实验研究结果外部效度的一个完整排序。(2)两标准综合排序方法在嵌套社会困境实验结果上具有可操作性,并可推广到其他类似问题。(3)外部效度的排序结果在实验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应关系,这一排序结果向决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将实验研究结果外推到现实管理实践中去的参考选择依据。(4)该方法在新公共治理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新公共治理下,公共问题的解决需将公民参与和不同层面主体间互动放在一起研究,数据收集困难使实验愈发受研究者青睐,而实验结果与实践之间的联结则需要用到该方法。

该方法更适用于把实验作为模型应用的研究,经济学实验有两类作用:一类是传统的理论检验,先有演绎理论结果,然后设计实验作为检验工具,特点是为已有理论服务,理论先行、内部效度优先;另一类是近年来受到重视的模型或探索实验作用,产生的原因在于演绎理论发展不充分,实验超越现有理论发展限制,研究的中心是实验而不是演绎理论,特点是实验先行,通过归纳在实验中发现的规律,形成新知识。如果实践是实验的目的,那么探索实验结果被排序后,不仅能够产生直接指导实践的知识,也会促进探索实验设计改进,间接服务于实践,实验结果排序能使经济学实验更好地“在王子耳边低语”。

中国经济研究

4.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评价及主要障碍

于敏（北京大学）、王小林（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测量与评价》，《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近年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迅速，但收入和非收入方面的差距迅速扩大，学者针对此问题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理念。包容性增长虽然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统一和公认的定义，人们把各种美好的愿望都寄予包容性增长，如降低贫困程度、降低收入不平等、社会和谐、政治民主、国际关系平等。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定义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基本理念都是让弱势群体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过程，共享增长的成果，它强调两个方面，一是机会平等，二是经济增长。

根据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可以从经济增长的前提、过程、结果是否具有包容性进行评价和测量，借鉴麦肯林（2010）评价方法，从四个维度评价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1）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前提，只有保持高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就业机会，从而使弱势群体有机会就业，通过劳动获得收入。

（2）降低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包容性增长最终目的是保证结果的公平和使贫困人口受益，社会贫困状况和收入不公平程度直接反映社会成果是否共享，是否惠及中低收入人群。（3）参与经济机会过程的公平性，人们能否参与经济活动不仅取决于客观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机会，还取决于个体参与经济机会的能力，而个体能否参与经济机会，取决于个体能力以及政府为提高人的素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如道路、饮水、健康、教育的可获得性。（4）获得基础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消除极端贫困，让所有人公平参与经济活动的前提，社会保障也是调节社会再分配，实现经济增长过程和结果平等的有效手段。

我们对以上四个维度进行分解，设置一套评价指标体系，考察上世纪 80、90 年代和本世纪前 10 年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趋势和特点。评价结果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包容性的趋势，经济增长迅速并且带来了广泛就业，提高了人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社会保障水平。但是，中国包容性增长整体水平比较低，并且发展缓慢。

排除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其他衡量指标都呈包容性增长的趋势。但是，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发展趋势越来越严重，大大抵消了其他增长指标取得的成果。分阶段来看，1990-2000 年，包容性增长进步较快，而 2000-2009 年，包容性增长进步则相对缓慢，这主要由于居民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不平等迅速上升。1990 年、2000 年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 0.3485、0.4382，2009 年则超过了 0.45；1988 年、1999 年、2007 年城乡基尼系数分别达到 0.36、0.4 和 0.44。收入不平等呈现的不包容趋势远远大于其他指标的包容性趋势。因此，收入不平等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主要障碍。中国未来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在降低城乡不

平等、居民收入不平等方面下功夫。

5. 工业化中政府作用的经济分析

肖翔（中共中央党校）、董香书（北京大学）

《工业化中政府作用的动态经济学分析》，《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目前大多数经济增长模型，都侧重讨论经济增长总量，而对经济结构研究略显不足。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未能在动态经济学框架内更深入地刻画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过程。Acemoglu 和 Guerrieri（2008）从供给层面讨论了资本深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但却忽略了政府在工业化与经济结构变迁中的作用。

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 1949 年以来，政府主导的中国工业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 年中国处于“求强”阶段，政府举全国之力优先发展重工业；1979-1997 年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推行外延式的工业化；1998 年至今，在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下，我国进入了重化工业重启阶段。在新中国 60 年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始终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在 Acemoglu 和 Guerrieri（2008）的基础之上，借鉴 Barro（1990）的思路，将政府纳入动态经济学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通过理论模型的研究，得出一些基本结论：

第一、政府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征税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补贴，政府的干预力度（税率）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稳态资本、产出呈倒“U”关系，与社会总资本和总产出也出现倒“U”关系。这也许能够部分解释我国片面发展重工业所带来的国民经济难以维系的历史过程，对 21 世纪以来我国重化工业进入新一轮扩张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亟需调整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第二、在一定区间内，提高税率可以带来资本密集型产业拥有更高的稳态资本与产出，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稳态资本和产出会下降。这给我国政府长期扶持工业所带来的较高的工业水平以一个可能性解释。因为，即使政府提取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进入了倒“U”的下行阶段，而政府扶持的资本密集型部门仍在倒“U”的上行阶段。这也给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工业在政府的扶持下继续高速增长而农业发展则相对缓慢以一个可能性解释，还能部分解释 21 世纪以来出现第二产业上升与第三产业下降趋势的本质原因。

第三、政府的收入也与政府对产业干预力度呈现倒“U”关系。这说明从政府最大化税收的角度来看，也并不是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干预力度越大越好。这给我国政府积极主导 80 年代初期的工业化转型以一个可能性解读。21 世纪以来，在政府促进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收入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是，如果这种经济模式长期维系，将影响经济发展，从而不利于政府收入的持续增加。

第四、从动态转移来看，政府税收的收敛速度快于资本与产出的收敛速度。这也许能够部分解读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推进工业化的偏好。因为在一定区间内更多地进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扶持，政府的税收将以较快的速度收敛到更高的均衡点。

1949 年以来,在政府主导下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改革开放前,我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政府运用有形之手加大对重工业的投入,并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但由于在推行该战略时,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平衡,最终使得这种发展模式难以维系。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新一轮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机制与改革开放前 30 年有较大的不同,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土地、资金、资源、能源等基础投入品的价格管制来补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化工业过快发展带来当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局面。在我国未来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应当逐步改变对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度补贴的发展模式,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6.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及其空间效应分解——基于 SUR-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

陈得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陶良虎(武汉理工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3 期

近年来,随着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等成功将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体系,经济增长的空间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再一次受到了经济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空间的角度分析空间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空间效应包括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空间异质性是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空间依赖性是指各区域空间的相互关联性。从空间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作用机理来看,空间异质性是形成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的前提和条件,空间依赖性则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之一。

中国区域空间存在鲜明的异质性,空间异质性是形成东、中、西梯度分布格局的基础,是形成中心区域(东部)、次级区域(中部)、外围区域(西部)三大空间俱乐部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区域空间上,空间依赖性区域空间联系的外在表现。空间依赖性主要通过两种机制产生空间联系:一种是“极化效应”或称“回流效应”,它是指周边地区各种优质生产要素向中心地区聚集;另一种是“涓滴效应”或称“扩散效应”,它是指中心地区的生产技术、经验和要素等向落后的邻近地区扩散。如果极化效应超过涓滴效应,那么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作用之下,将导致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变缓。举例来说,随着大量优质劳动力、资本向少数发达地区集中,极有可能使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此外,由于政府发展战略推动,扩散效应可能大于回流效应,从而使得发达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技术设备、人力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渗透,提高其经济增长速度。

在中国既有的中心、次级、外围三大空间俱乐部中,中心区域间的空间依赖性逐渐增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中心区域对次级区域的扩散效应已初步显现,但中心区域的整体能力不强,还不足以在带动外围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次级区域和外围区域间的空间依赖性以负作用为主,需要我们在协调区域发展中对其予以足够重视;次级区域对中心区域的回流效应比较明显,而外围区域的回流效应影响十分有限。进一步研究发现,中

国区域空间依赖性主要是通过东、中、西三大区域空间梯度传递的。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区域发展中的空间关联效应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对于次级区域和外围区域而言,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中对其应予以足够重视。为实现区域经济的整体增长,各级政府应继续贯彻以城市群为发展增长极的区域发展战略,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空间依赖性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快沿海等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中心区域的整体素质,扩大对外围区域的扩散效应;加大对次级区域和外围区域间利益关系协调力度,改善区域间竞争合作关系;继续深化中部崛起战略,加快次级区域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次级区域在协调东部和西部经济差距中的重要作用。

7. 中国品牌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刘华军 赵浩 杨骞 (山东财经大学)

《中国品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与影响因素——基于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方法与中国品牌 500 强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2 年第 3 期

21 世纪是品牌经济的时代,品牌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竞争中最重要而普遍的要素,它同价格等一起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品牌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成为衡量地区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近 200 种产品销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是无可争议的“制造大国”。但是由于缺乏自主品牌与核心技术的支撑,“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多数仍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最低端,不仅利润分配少得可怜,而且在生产过程中付出了高额的资源和环境成本。目前,中国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较少,品牌的严重缺失造成了我国经济利益在国际竞争中的大量流失。中国也充分认识到发展品牌经济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品牌经济,各地品牌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整体来看,中国的品牌经济已经进入快速提升甚至加速阶段。然而,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而品牌经济更是刚刚起步,因此我国的品牌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品牌在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空间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异。从品牌经济发展地区差距的角度出发,它为探讨区域品牌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方法;同时对品牌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的研究,也为我国各层面主体制定品牌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根据《中国品牌 500 强》报告提供的相关数据,不论是品牌价值还是品牌数量,我国东部沿海品牌发展均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态势。中国品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也在逐年扩大,东中西三大地区划分情形下,地区间品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界限,地区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而三大地区内差距则构成了总体地区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品牌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来看,首先,区域内的品牌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循环累

积效应。这一方面意味着该区域在初期产生的某些强势品牌,会吸引更多的品牌进入该区域;另一方面表明该区域内的企业受到已有强势品牌的影响,自觉地加强品牌建设,并最终成长为强势品牌。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该区域最终拥有的品牌数量及其品牌价值不断增加。其次,市场容量、区位条件对于品牌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随着生产力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产品需求的多样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直接促进了品牌经济的发展;同时品牌所在区域的区位条件,对品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三,R&D投入和市场竞争程度在品牌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中作用并不显著。这一方面表明当前中国企业的R&D可能主要应用于生产技术领域,而没有投入以消费者和市场为导向的品牌建设中去;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的市场竞争对促进各个区域品牌的发展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近年来,中国品牌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品牌经济发展地区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品牌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仍不完善,相比于发达国家,实现我国品牌经济的健康、快速、科学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8. 国有企业效率与退出选择

朱克朋(安徽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刘小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国有企业效率与退出选择——基于部分竞争性行业的经验研究》,《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国有企业效率是一个人们比较关注的话题。大量数据都表明了这样一种情况: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总体效率是较低的;而除部分例外,企业在退出国有关部门后,通常会采取更多改进经营的措施,使得业绩有较大提高。那么,从效率角度上讲,国有企业应该退出,特别是效率低的企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些学者发现,退出国有关部门的改制企业往往是绩效比较好的企业,国有企业退出过程中存在着“靓女先嫁”的现象。

我们认为“靓女先嫁”的结论可能是因为他们数据出了偏差。设想这样一种情况,研究者设计问卷对企业进行调查,问卷中会问企业有没有改制、哪年改制退出等一系列问题;研究者把问卷收上来后比较一下改制企业和没有改制企业的效率,结果发现改制企业原来是一些效率高的企业。但是,他们忽视了另外一些退出国有关部门的企业。这些企业已经完全打散重组,原企业已不存在了。既然不存在,也就没法回答你的问卷了。如果这些企业往往效率较低的话,你还能得出“靓女先嫁”的结论吗?显然不能。

为了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企业更有可能退出这个问题,我们用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做了分析。这个数据库比起其他的数据库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些打散重组的企业也在数据库中,至少他们在“活着”的时候统计局对他们进行了统计。我们对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企业一比较,发现选择退出的既包括效率高的企业,也包括效率低的企业。并非效率高的企业先退出,两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效率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民营化改制,即以转变为非国有资本控股的方式退出国有关部门;效率低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破产清算或打散重组的方式,完全退出国有关部门。

其中的道理是：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抓大放小”和退出竞争行业等一系列政策，政府已不再为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债务买单，也不会随便借钱给他们了，那些欠了很多债的国有企业得想办法自己解决。有些国有企业虽然欠的债比较多，但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盈利性还是很强，这些企业往往具有较好的品牌和信誉，以及较为稳定的市场份额，企业是不会放弃这些资产的。这类企业由于基础好、有实力，更容易吸引外部资金的进入。这样，当外部资金以股权的方式进入时，非国有资本在这些企业中的比例将会增大，从而转化为非国有企业，退出国有关部门。这样就出现了效率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改制的情况。

而对于部分效率低、盈利能力较差的企业，通常已经无法正常生存，他们只有通过完全改组改制等方式才有出路。改组改制后的企业彻底与以前的企业撇清关系，甩掉所有以前的不良债务，轻装上阵，改换门庭，另起炉灶，不再沿用以前企业名称，完全以新的面目出现。另一些盈利能力非常差的国有企业，亏损累累，发展无望，因而直接破产清算，退出市场。

当然，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05 年前后这段时间的情况，这是国有企业退出的第一个阶段，即国有企业将近十年的退出潮。据《中国财政年鉴》中的数据显示，1997 年，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 26.2 万户，到 2006 年降到 11.9 万户，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2006 年后，国有企业退出的速度放缓，数量减少不多，国有企业退出进入到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政府更多考虑到社会稳定，因此企业退出过程中可能会较少地体现到效率目标。事实也是如此，这一阶段国有企业通过改制退出的微乎其微，效率低的企业也要到万不得已时才完全退出。

9. 国有企业需要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吗？

魏峰 荣兆梓（安徽大学）

《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和分析——基于 2000-2009 年 20 个工业细分行业的研究》，《经济评论》2012 年第 3 期

效率是任何经济社会所关注的永恒命题，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依赖于相对效率的比较，相对效率好的企业胜出，效率差的企业被竞争所淘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99 年 9 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深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沿着关键领域和竞争性领域两条主线不断推进。基于之前国有企业效率在竞争性领域的表现差强人意，国有企业应当尽快从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逐渐成为主流的思想，显然这种思想并未充分注意到国有企业效率近年来发生的新变化。这一新变化就是，自 20 世纪末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益显著增长，效率大幅提升，一改过去给人的效益、效率双低下的印象，近年来的相关文献也逐渐反映了这一变化。不仅如此，国有企业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的技术效率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也并不逊色，并且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发展态势。

技术效率指标常用来体现制度改革等政策的实施所引起的效率变化的结果,能够更有效地反映改革成效。从竞争性领域 20 个行业综合来看,在 2000-2009 这 10 年期间,竞争性领域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工业细分行业技术效率之间的差距一直存在,但均表现为递增的态势,并且前者的增速显著大于后者,使得两者的效率差距具有明显缩小的趋势,即存在趋同的迹象。2000 年,20 个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年度技术效率均值为 0.41,非国有企业为 0.63;到 2009 年,国有企业的年度技术效率均值达到 0.72,已经非常接近非国有企业的 0.74。同时,国有企业内部的行业技术效率增速差别较大,表明 1999 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政策对竞争性领域行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是不均衡的;而非国有企业的行业技术效率值则表现相对稳定,并存在趋同的迹象,说明竞争性领域非国有企业行业技术效率受政策影响作用相对较小,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升了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结论是可信的。

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在最近 10 年的改革与发展中持续提高了其技术效率,这应该是其利润指标逐步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源于其正的外部效应,而且源于其技术效率的不断提高。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成绩不应轻易否定,那些要求国有企业目前就必须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观点缺少科学依据。国有企业可以在技术效率表现较为突出的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行业继续保留,以充分发挥其技术效率优势。

总的来说,自 1999 年以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以来,我国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已经逐步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而且尚有增效的空间和能力。提高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事实证明,在一个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国有企业只要坚持改革,强化管理,经济效率是能够提高的。我们需要做的是继续深化改革,继续缩小与非国有经济效率上的差距。只有当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总体上与非国有企业旗鼓相当,国有企业完全具备了与非国有企业竞争的能力时,我们才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发育完善

10. 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

张志强(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3 期

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紧密相连,这一问题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通过研发创新,拓展区域发展的技术前沿,实现区域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性选择,也是要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的关键。在这一逻辑框架中,金融发展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综观现有的研究,我们发现多数都侧重独立地分析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经济关系的相互关系,而以研发为支撑的创新产出,如何随着金融发展效率与金融发展规模等金融环境的宏观变化而变化,还缺乏实证方面的研究。因此深入分析它们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我们构建了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中国区域技术深化的

实证研究框架,以面板协整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规模与金融发展的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实证研究结论如下:

区域层面上金融发展与研发创新产出之间,存在明显的长期协整关系。区域金融发展的规模具有显著的创新促进效应,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能够揭示中国区域层面上创新产出的来源,创新产出进一步引致了区域层面的技术深化。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的总体创新效应为负,但是分区域的差异则尤为明显,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省份金融发展的效应显著为正,而西部地区省份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的创新产出为负。说明对于广大的西部地区省份而言,金融发展的效率还不能为西部省份的创新产出提供融资来源,进而间接影响了西部地区省份的技术深化,这也成为形成我国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分产业而言,虽然制造业的金融发展效率对于所有的区域而言都存在显著的创新促进效应,但是对于第三产业,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在中西部地区,该参数的影响效应为负,说明对于中西部地区省份的服务业企业而言,如何进一步通过融资来实现企业的产业技术升级变得尤为重要。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往往是生产型与服务型服务业的主体,而他们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正规的金融机构难以获得资金来源,从而限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进一步阻碍了相关制造业产业的发展与技术深化。因此,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应更加注重金融发展的效率的提升和培育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来源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我们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估计表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金融发展的规模的创新效应,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这也为进一步深化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市场潜能作为控制变量,也具有显著的创新促进效应。依据新经济地理理论,市场潜能代表了经济发展的区际联系程度,这是通过贸易(国际及区际)实现的,现有的关于创新与技术溢出方面的研究,已逐渐关注贸易(国外与国内)的研发创新效应,我们通过市场潜能指标的构建,表明了贸易所带来的创新效应是显著存在的,但它所带来的效应在区际间仍然存在明显差异,这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的创新效应差异基本一致。因此通过加强区际以及国际贸易联系,促进中西部地区省份的技术引进与研发创新,共享知识技术溢出效应,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技术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东、中、西部地区在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区域之间金融结构上的发展差异,然而金融结构的区域技术深化影响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没有从微观产业及企业层面上揭示金融发展的规模、金融发展的效率的技术创新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实现机理,这也将是深化研究的方向。

11. 一个争议问题的再检验: 居民资产是否促进了消费?

张五六 赵昕东(华侨大学)

《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差异性研究》,《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国力增强了，人民富裕了，普通居民也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或多或少的资产。资产的拥有，使得人们产生一个错觉，资产能促进消费，即带来了所谓的财富效应。资产的财富效应在学术研究中成为持续不断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其加入了研究范畴，有的认为资产存在财富效应，有的认为资产不存在财富效应，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其实，资产的累积与消费的需求是两方面的，资产是双刃剑，既可能促进消费，也可能抑制消费，如经典经济学教材提到的，资产对消费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其对居民的消费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抑或是挤入效应多一点，还是挤出效应多一点；也可能在短期内是挤入效应，长期内是挤出效应，抑或反之都有可能。

一般把资产分为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实物资产主要包括耐用消费、住宅等，金融资产主要包括手持现金、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储蓄性保险等。根据我国城镇居民资产核算发现：在实物资产中居民住宅资产占实物资产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25% 左右，逐渐上升到最近几年的 65% 以上；而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占金融资产的比重一直在 60% 以上，特别是 1995 年后基本维持在 80% 以上的水平。因此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对消费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其持有的资产结构状况：在金融资产中主要取决于占超额比重储蓄存款与较小比重其他金融资产在长短期内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的力度对比；同样，在实物资产中主要取决于住宅资产在长短期内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的力度对比。

在重新核算城镇居民持有资产的基础上，我们采用最新发展的 ARDL-UECM 模型计量分析了长短期内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对消费的不同作用，并对其产生机制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得到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虽然短期内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有较弱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由于金融资产的不合理结构，特别是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存在，使得超额比重的居民储蓄存款对其消费有一定限度的挤出效应。二是由于我国绝大部分住宅持有者是自有住宅家庭，近些年来房价的攀升只会带来短期内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而长期内对消费的影响有限，导致实物资产在长短期内对居民消费分别产生一定限度的、较强的促进作用。

从金融及实物资产在长短期内对城镇居民消费所体现作用及其形成机制的探索中，我们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收入预期。只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这张居民生活的“安全网”，才能降低居民在收入、支出中所面临的极大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对持有资产风险的偏好及承受能力，增强居民对收入的预期，提高资产对消费的挤入效应。二、完善资本市场秩序，优化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只有不断加强和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才能提高城镇居民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扭转并降低城镇居民持有超额比重存款储蓄的不利局面，增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提高其挤入效应。三、抑制房价不断攀升，促进实物资产财富效应。只有坚持并不断完善目前实施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才能有效抑制由房地产泡沫不断推升的房价上涨，降低其对城镇居民当期及潜在消费能力一定限度的挤出效应，达到提升实物资产挤入效应的目的。

12. 财政援助性支出与农村贫困家庭的民生

林昕 刘穷志 (武汉大学), 李宇 (深圳大学), 温逸露 (武汉大学), 《经济评论》2012 年第 3 期

贫困与民生是政府援助的重点, 效果如何更是研究者的研究热点。这里有两个焦点之争: 一是政府援助有效吗? 即援助是否激励了贫困人口脱离了贫困, 民生是否得到了改善? 二是政府援助对于民生来说是长期有效还是短期有效? 两类争论分别涉及政府援助的纵向与横向民生效果评估。

依据现行农村家庭援助制度, 我们可以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 (CHNS)。适应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并考虑到本世纪中国贫困与不平等恶化的现状, 我们采用 2004、2006 和 2009 年三年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跨时五年。基于中国农村减贫制度, 并考虑是否与贫困减少、民生以及政府援助相关, 我们筛选变量。依据现行中国农村救助体系特征, 在该数据库中, 我们选取“J6a” (困难补助, 残疾补助或福利金) 作为中国农村贫困与民生救助指标。其他指标有收入、消费等。本文设计二阶差分法。二重差分 (double-difference) 法评估的是一个项目的效果, 它是以项目非参与者的结果来揭示项目参与者的反事实变化。

关注 2004、2006 和 2009 年的平均收入和消费, 我们使用了三种贫困线 (600、800 和 1000)。研究发现, 获得援助的家庭在 2004-2006 年期间的收入增加额大于没有获得援助的家庭的收入, 但是, 2006-2009 年与之相反, 援助并没有让受援家庭的收入超越没有受援的家庭。(1) 平均效应的二重差分估计。我们对收入、消费和无储蓄的平均效应进行简单 DD 估计。给出 2006 和 2009 年绝对水平和对数形式上的估计, 后者对于穷人家庭所得给予了更高的权重。2004 年为基准线。可以看到, 政府援助对于平均收入有相当大的且显著的影响, 但对消费没有影响; 2006 年大量的收入被储蓄起来。在收入分解方面 (分解为耕作收入、畜牧收入、渔业、种树、非农产业等), 表现为显著影响的是家庭畜牧饲养, 它对净收入影响的 DD 估计是 93.37 元 ($t=3.11$)。当使用加权与匹配时分别升至 119.34 ($t=3.53$) 和 138.59 ($t=3.64$), 以纠正选择偏差。(2) 效应中的异质性。我们关注的异质性是家庭成员最初的特点, 并依据最初收入和教育来检验效应的差异。当我们以教育分层时, 对于任何产出变量来说, 得分加权下的二者差异并不明显。但是, 当我们用最初的收入分层时, 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异, 低收入组的收入是显著的长期增长。考虑收入与教育相互作用, 我们发现, 长期收入增长最强劲的是低收入家庭中受教育较好的组, 发现了这组资产和住房的显著与长期效应, 但是, 没有发现对农业生产力有什么影响。不过, 我们发现了中位收入以上的家庭生产力增长的一些迹象。异质性表明, 援助的不同配置将全面地放大效应。相对贫困但受教育较好的家庭组参与率略高一些, 项目稍微偏向这些家庭。假如援助选择仅集中于受教育较好的贫困者, 那么, 援助效应将整体上升。

这一研究是给予农村贫困家庭的政府援助的民生效果评估。通过构建二重差分法, 并运用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 短期的收入增长大部分被储蓄起来, 长期来看, 只有

适度的消费增长。不同类别的家庭对于政府援助的反应是不同的,教育程度较高的贫困人口受政府援助的负面影响较小,民生状态较好,政府援助的溢出效应不大,主要结论是稳健的。基于此,我们提出两点政策建议:一是必须纠正扶贫过程中加大援助力度就能改善民生的幼稚想法,研究援助的横向效应与纵向影响,确定援助的最优规模。二是优化援助结构,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为持续改善贫困人口的民生状态奠定基础,并提高援助的整体效率;重点援助家庭畜牧业,尽快给贫困人口带来收入增长,以缓解现时贫困。

13. 农民工、社会网络和劳动合同形式: 一个案例研究

王啸华(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当前中国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企业纷纷提高工资以招徕工人。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会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从而使得中国在一部分产品上失去国际竞争力。但是,企业真的会坐视工人工资上涨而不进行任何调整吗?显然不会,我们可以设想企业会改变其用工方式,使得工人在得到更高工资的同时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显然会抵消一部分工资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这种调整在现实当中存在吗?

研究案例是河南省林州市农民工的外出建筑务工队的劳动组织方式变革。在2005年之前,该市的民工建筑务工队采用的劳动组织形式非常类似于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方式:民工在工地队长(这种称呼也是来自人民公社)的指挥和监督下劳动,报酬采用固定工资的形式,而这种工资跟民工的产出联系不是特别紧密。这种劳动组织方式的效率也非常类似人民公社:工人干活没有动力,存在着普遍的“磨洋工”现象。从2005年开始,建筑务工队的劳动组织方式发生改变,一种劳务外包的方式流行起来。在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下,包工头会把各项建筑工作分别承包给几个专业的民工团队,这些民工团队的报酬跟他们完成的工作量紧密相关,基本上是计件付酬。在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下,民工的劳动积极性高涨,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以前的3~5倍,但同时他们付出的努力也要远远超出从前。因此,如果单纯地看民工的工资,也许认为包工头的成本会大幅上升,但是民工努力程度的提高可以将这种上升的成本中的相当一部分给抵消掉,而这一切都是由劳动组织方式改变带来的。

为什么河南省林州市的民工建筑务工队的劳动组织形式会发生上述变化呢?这要从房地产业及与之相关的建筑业说起,2000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额为4984.05亿元,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额变成了61740亿元,十年间增加了10倍多,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剧增意味着对建筑工人的需求会大幅上升,但是,中国的农村不能无限地提供剩余劳动力,所以包工头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并同时改变劳动组织方式以激发民工的劳动积极性。

在这种劳动组织方式改变的过程中,社会资本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在2005年之前,为什么包工头会采用那种无效率的劳动组织方式呢?这种劳动组织方式跟人民公社如此类似,包工头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无效率。我的解释是:前些年,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非常多,非农就业机会很稀缺;而在上述那种无效率的劳动组织方式下,每个工人付出

的能力水平都很低,这样包工头就需要雇佣很多工人,而这些工人大都是包工头的亲戚朋友,这样包工头就可以为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了,当然这种工作的报酬不高。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这就是劳动组织方式发生改变前社会资本的作用。而当“民工荒”出现后,就业机会不再稀缺了,社会资本的作用也就开始发生改变了。正如前面提到,包工头要把各项建筑工作分别承包给几个专业的民工团队,而在这些民工团队形成的过程中,社会资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传播务工信息和防止个别民工偷懒等等。

当然,案例研究只是个别现象,但是我们可以从这种个别现象得到一个推断:随着民工供给的短缺,各种更有效的劳动组织方式会被发明出来,这些劳动组织方式会为民工提供更强的激励,而民工的报酬也会对其产出更加敏感。至于这一推测是否会构成一种普遍趋势,只有通过大规模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

14.收入风险冲击影响了农户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吗?

马强文 任保平 韩锦绵(西北大学)

《收入风险与劳动力配置多元化:以陕西省为例》,《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农业不同于城市工业,是典型的风险性产业,其所受到的风险冲击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更加难以克服。作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农户往往缺乏包括现代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的正式风险规避机制,农户被迫采取自我保险机制,对于没有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民而言,尤其如此。其中,生产经营中的风险规避是农户的普遍做法,比如,农户常常坚持使用保守的农业技术,而在使用可能带来利润增加的新技术时态度非常谨慎,选择虽然低产但却能抵抗各种不良天气变化的作物,在土地规模狭小的情况下选择种植多种农作物,甚至还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和经营。

关于农户风险冲击对农户劳动力多样化的影响研究非常多,但很少能深入分析各种风险冲击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因此,我们试图使用在陕西农村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就农户收入风险对劳动力配置多元化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

通过构建 tobit 模型就收入风险冲击对农户劳动力的多元化程度影响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经历自然冲击的农户劳动力多元化程度显著高于未经历自然冲击的农户,因而,自然风险冲击仍然是影响农户劳动力的优化配置的重要因素。经历市场冲击的农户劳动力多元化程度显著高于未经历市场冲击的农户,这表明,虽然中国农业市场化程度日益上升,但其对农户劳动力分配决策影响有限,可能原因在于政府对投入品与产出的价格补贴。经历技术冲击的农户劳动力多元化程度显著高于未经历技术冲击的农户,采用新技术存在的风险不利于农户进行合理的劳动力配置。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种类的风险冲击对农户劳动力的多元化配置影响不同。其中,技术冲击影响最大,自然冲击次之,市场冲击较小,健康或失业冲击则不显著。因此,相应

的政策建议是：首先，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降低技术风险冲击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在推广新技术、新品种的过程中，一方面尽量减少技术不成熟、品种不适应带来的产量下降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增强对农户的现代农业科技培训力度，提高农户的科技水平，提高农户对新技术、新品种的认知程度。这样可以提高农户应对技术风险冲击的能力，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其次，根据农业生产中自然风险的协同效应，商业保险不太愿意参与农业保险，因此，要降低自然冲击，一方面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稳定农户的自然风险预期。另一方面需要国家财力支持，对农业进行强制性保险与农户自主保险相结合。以此有效减少自然冲击对农户消费波动的冲击，从而影响到其劳动力多元化决策。

15. 整体上市热潮之我见

王永海 章涛（武汉大学）

《整体上市与股东财富、经营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集团公司纷纷将集团内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出现了以往被“分拆”的公司重新整体上市的现象。尤其是一系列政策意见的出台，为我国集团公司实施整体上市提供了充足的政策支持。然而，在新一轮整体上市热潮即将全面展开时，整体上市是否能真正有效地消除分拆上市带来的种种弊端，抑或还是集团公司的另一种圈钱行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众说纷纭。

通过研究现已完成整体上市的公司，如上海汽车、百联集团等，我们不难发现整体上市确实可以使集团公司的产业链得到延伸，减少上市公司与集团公司之间的不正当关联交易，降低交易费用，产生规模效应，还可以减少集团公司内部的同业竞争，带来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和财务协同效应，从而实现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增加股东财富的目标。

面对新一轮整体上市热潮即将来临，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不同企业的整体上市将会产生不同效果，甚至可能出现个别公司打着整体上市的旗号私下进行圈钱的行为。根据我国资本市场环境，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对集团公司的整体上市的政策指导。有关部门应积极推进符合条件的集团公司实施整体上市，尽量为企业缩短整体上市的过程，同时积极向非国有企业推行整体上市计划。

二、强化对集团公司整体上市的监管。首先，相关证券监管部门需要严格监督整体上市的标准和程序，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投资者保护，严防通过整体上市“掏空”上市公司以及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其次，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降低上市公司与其他集团公司的关联关系。最后，督促上市公司制订实施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

三、规范集团公司整体上市的信息披露制度。由于集团公司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实施整体上市的过程，涉及到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关联交易，在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控股股东利用这一资产的买与卖之间的关联交易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因此,证券监管部门、国资委、各级地方政府、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应当对注入上市公司资产的真实质量及定价方法进行严格审查。如发现控股股东在整体上市中注入劣质资产,应对控股股东严格惩罚,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取消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在资本市场运作的资格。

四、集团公司需要注重整体上市给上市公司带来的长期业绩增长。整体上市能够带来价值的增加,这种效应最直观的反应是宣告整体上市后股价的上涨,但是这种短期市值的提高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仅仅是资本市场的投机炒作,整体上市需要更注重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以便从长远的角度,综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得上市公司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五、对于投资者而言,要冷静地看待整体上市。对企业宣告整体上市的短期效应要冷静分析,更应该注重整体上市后上市公司实力是否真正提高,整体的产业链和公司结构是否能支撑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这就要求广大投资者不能盲目跟风,只关注短期股票价格的波动,应该回归理性,对上市公司的报表及公司战略进行详细的分析,准确地权衡上市公司的投资风险与报酬。

16.法律、审计与企业价值

余玉苗 王宇生(武汉大学)

《法律制度变迁、审计师选择与企业价值——基于实际控制人掏空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企业的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的现金流。企业经营得越好,其产生的现金就越多,企业的价值也就越高。但是对于中小股东来说,其持有的股票价值并不等于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价值。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许多上市公司都存在着大股东,这些大股东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利,侵占本属于中小股东的利益。此外,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可能会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以获取私人的利益。考虑到大股东、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小股东在购买股票时所愿意付出的价格肯定要低于企业创造的现金流的价值。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某个公司的现金流全部被侵占,那么将没有人愿意花钱购买该公司的股票。更为关键的是,中小股东很难区分上市公司中哪些大股东不会侵占公司的资产、哪些管理人员是勤勉尽责的。因此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对于那些不存在侵占行为的公司,中小股东也只愿意折价购买其股票。如果这些不存在侵占行为的公司不愿意折价销售自己的股票,最后会导致市场上流通的都是一些差公司的股票。一个仅仅由差公司构成的资本市场无疑是缺乏吸引力的,最终走向没落也就是必然了。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很多国家都针对大股东以及管理层对上市公司的侵占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立法。我国的《刑法》就指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

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高昂的违法成本将使得侵占人在许多情况下进行的侵占得不偿失,侵占行为会因此大大减少。此时,中小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评价也会提高。另一方面,不存在侵占行为的公司也会努力把自己和那些存在侵占行为的公司区分开来。这些公司可以通过聘请一家社会上公认的优秀会计师事务所对自己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以向投资者发出积极的信号。这是因为当大股东或者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行为之后,其必须通过会计操纵来对其行为进行掩饰。优秀的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更高的几率发现这些操纵行为,且为了保全其声誉这些会计事务所的独立性更高,更难被收买。那么法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与审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法律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对单个企业来说,使用成本比聘请一家优秀的会计事务所要低得多。

通过对民营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我们发现在我国《刑法修正案(六)》公布以后,民营企业的价值普遍提高,但与没有聘请优秀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相比,聘请了优秀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价值提升得要小一些。这说明法律的完善,降低了中小股东对掏空等机会主义行为顾虑,提升了其对企业的评价;法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与审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能相互替代。这些分析表明法律在我国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为此,应大力完善我国的法制体系,严格法律的执行力度,以促进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17.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再思考——论东亚转移效应

李强(国家信息中心)、王孝松(中国人民大学)

《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东亚转移效应》,《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迅速攀升,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学术界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中美双方统计口径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其次,美国储蓄率过低和中国储蓄率较高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和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再次,人民币汇率与国际收支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人民币汇率低估是造成中国顺差的原因之一;最后,生产分割和国际分工的出现使某种产品的生产和最终出口可以在不同国家进行,使得一些不具备技术优势的国家也能够生产并出口高技术产品。生产分割和国际分工理论应用到解释东亚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多边贸易模式,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迅速攀升的同时,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迅速上升,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扩大有很大一部分是承接了来自东亚经济体对美国的顺差转移,即产生东亚转移效应。目前学界和政府都十分重视东亚转移因素在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作用。

从中美贸易的微观结构上来看,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在中、高技术产品上的贸易顺差快

速增加,已经成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来源。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而基于国际分工理论的东亚转移效应则较好地解释了中国在较高技术含量上具备出口优势,技术含量越高的产品越容易被分割来进行生产,或者说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产生的中间品数量会更多,所以东亚转移效应在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上就更明显,而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则可能不存在东亚转移效应。研究东亚转移效应的能够使我们从更加开放的层面和更加微观经济结构的层面,来揭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们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东亚转移效应以及东亚转移效应在不同技术分类下的不同表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中国对东亚的投资开放度和加权实际汇率两个指标来度量东亚转移效应,并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东亚转移效应是中美贸易顺差扩大的重要因素;东亚转移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技术和中技术产品上,低技术产品和初级产品则不存在显著的东亚转移效应;高技术产品上的东亚转移效应要明显大于中技术产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有助于减少中、低技术产品顺差,但对高技术产品的顺差几乎没有影响。

如何有效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我们提出以下四方面的政策建议。首先,审慎对待人民币汇率升值,稳步、有序地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其次,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海外投资。再次,以技术创新为依托,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最后,坚持走出口多元化道路。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自1980年创刊以来，本刊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态势，《经济评论》适时调整和更新研究主题，强调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大力扶持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与国际学术刊物规范接轨的力度，不断提升《经济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27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28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全国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排名第4；根据最新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在全国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位居第5。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http://jer.whu.edu.cn>)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